

我们的

元帅





2 032 6722 2

我们的元帅

纪 学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我们的元帅

纪 学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86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3094·327 定价：0.95元



目 录



最后的十年.....	(1)
征途上的爱情.....	(11)
我们的元帅.....	(20)
狮山情思.....	(27)
一颗金子般的心.....	(32)
历史终能辨假真.....	(38)
富有传奇色彩的人.....	(46)
真情.....	(53)
责任.....	(61)
将军仍走在征途上.....	(67)
他，仍然很忙.....	(76)
访女将军.....	(82)
战士·妻子·母亲.....	(92)
大姐们年轻的时候.....	(101)
理想·事业·爱情.....	(119)
元帅的夫人.....	(126)

书画伉俪.....	(137)
绵绵深情注笔端.....	(144)
他们的婚礼和蜜月.....	(150)
后记.....	(156)



最后的十年



一百年前诞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农家的一个孩子，后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，闻名中外的元帅，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。他，就是朱德同志。

尽管十年前的7月6日，朱德同志就怀着深重的忧虑，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而又正处在动乱中的人民，但他和蔼的形象，他光辉的业绩，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。对康克清同志来说，自然更是如此。

朱总诞辰百周年前夕，我又一次见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。我曾有幸听她讲过她和朱总一起走过的战斗历程，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他们始终相随相依，相濡以沫。然而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，他们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，却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。因为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，朱总和我们的许多老革命家一样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。而她，最了解朱总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鲜为人知的高风亮节。

谈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朱老总，康大姐说：“运动刚开始时，朱总很少说话，常常一个人独坐默想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。”

显然，对于那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，朱总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，也不能理解。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，他只能默默地思考，无言之中偶尔流露出心中的怀疑。一次，他突然问道：“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？”还有一次，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，将林彪那个大谈“政变”的讲话交给秘书，转身就走。以往，凡是中央的文件，或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同志的讲话，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。而这次却不屑一提。对林彪，朱总是深知其人的。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他就对康大姐说：“林彪过去有功，但他不愿见人，更不能团结人，把军队交给他，不知以后会搞成什么样子呢！”如今，林彪又大谈“政变”，朱总当然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这种鄙视态度，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？

这种沉默的时间并不长。当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，煽动造反派点名批判、关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，攻击刘少奇、邓小平及彭德怀、贺龙、陈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等老师的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时候，朱总坐不住了。他拄着手杖，在中南海院里看大字报，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。

面对那些造谣和诬陷，他要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，要么无言地愤懑，实在气愤极了，才说：“心怀叵测，心怀叵测呀！”

朱总的态度，林彪、江青一伙又气又怕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

1966年12月的一天，戚本禹奉江青之命，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。就在这天晚上，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。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，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贴满“朱德是黑司令”、“朱德是大军阀”、“炮轰朱德”等大字报。接着，北京街头也出现了“打倒朱德”的大标语，还成立了“揪朱联络站”，策划召开“批斗朱德大会”。对此，朱总一笑置之。当有人问他时，他坦然地说：“历史终归是历史，历史是最公正的！”

这时，康大姐也遭到了围攻。造反派说她是“走资派”，逼她揭发、交代朱总“反党、反毛主席的罪行”。康大姐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不是‘走资派’。朱总和毛主席是一起战斗几十年的战友，他不会反对毛主席。”又有人质问道：“你说，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？”康大姐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。是朱德和陈毅带领湘南起义的部队，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。历史在那里摆着，不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。”

有一天，康大姐回到家里，见朱总正看一张传单，传单上说：成立了一个“中国（马列）共产

党”，在一个地方开过会，朱总当了中央书记，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。朱总看过后笑了。康大姐问他笑什么，他说：“根本没有这回事，这是造谣嘛！让他们造去，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。”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，说：“现在，你成了‘黑司令’，我成了‘走资派’，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？”朱总充满信心地说：“只要有主席、恩来在，就没有关系，他们最了解我。你不要怕，‘走资派’多了也好。都成了‘走资派’，就都不是‘走资派’了。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。”

不久，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说：朱德还是要保。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然歪曲红军时期的一段历史，诬蔑朱总是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”。一天，康大姐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，拿这个问题问朱总。朱总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是党内的事情，我不能给你说。”康大姐着急了，大声说：“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，到底是不是？”朱总看着康大姐着急的样子，笑了笑说：“急啥子嘛！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，是就是，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，他们要找我代表，那就找吧。”从容的态度，显示出坦荡的胸怀。

听着康大姐叙述朱总在“文革”开始后临变不惊、泰然自若的事迹，我感到，在那场狂风暴雨

中，朱总象一棵参天的大树，不管怎样风吹雨打，都不摇不动，巍然屹立。

然而，对于这样一棵大树，林彪、江青一伙不摧毁是不甘心的。1969年4月，党召开“九大”，83岁的朱总抱病参加。那几天，他正患气管炎，喘得很厉害。林彪、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，在会上多次对朱总进行围攻，逼他作检讨。康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：“一次，朱总开会回来，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、邱会作。我说不认识。他又说，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。我想了想说，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？他‘嗯’了一声。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，就问他是什麼意思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‘这几个人，都左得不可收拾啰！’”

“九大”闭幕不久，朱总就接到一个“勒令”，要他和董必武、李富春、聂荣臻、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先念、徐向前等人交代“反党罪行”。朱总说：“不要理它！”到了10月，林彪擅自发出所谓“第一个号令”，扬言“要准备打仗”。康大姐怀疑地问朱总：“真的要打仗吗？”朱总淡然一笑，说：“现在毫无战争迹象。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，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，不是小孩子打架。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、迹象。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啊！”

康大姐告诉我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她就听说

要把朱总赶出中南海。她当时问朱总会不会这样，朱总说，有这个可能。他不幸而言中了。

根据林彪的“第一个号令”，朱总要被“疏散”离开北京。当时，他身边没有人，就对康大姐说：“康克清，你得跟我一起走啊！”正在被“专政”的康大姐为难地说：“对呀，我是该跟你一起走。可是，军代表要是不点头，我想走也走不了啊。”朱总沉思一会，无奈地说：“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，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的心不由一缩。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，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，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。那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呵！

就这样，朱总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广东（朱总从广东回到北京，再没有住进中南海）。关于在那里的生活，康大姐不愿多说。但我看到过一个材料上是这样记载的：当朱总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，连广州市也不许进，被直接送到从化。从化虽然风景优美，但朱总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的。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、农村去，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“桥头警戒线”。终日陪伴他的，只有康大姐。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，朱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，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。他最担心的，还是工农业生产。

是的，人民的生活疾苦，时时萦绕在朱总的心

头。从“文革”一开始，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，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，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。他反复强调，现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，要注意解决。后来，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，仍时时关心着生产，担心生产继续受到破坏。1972年9月以后，他以86岁的高龄，先后视察了七机部、一些工厂和农村。针对“四人帮”一伙把抓生产当成是“唯生产力论”的观点，他说：“别听他们‘革命’口号喊得比谁都响，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，破坏生产。不讲劳动，不搞好生产，能行吗？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没有粮食，让他们去喝西北风！”1976年春旱，朱总很着急。后来下了一场好雨，他十分高兴，雨一停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去量土层湿了多厚。不久，他又以90的高龄到京郊农村视察，看到麦子长得很好，才放下心来。那天正刮大风。他担心大风给桃、梨、苹果带来损害，便在途中的一个果园旁下车，向果农询问情况。得知这场风对果树结实没有妨害，他才微笑着上车而回。

康大姐说：“1974年1月，我到首都体育馆参加‘批林批孔’会，回到家对朱总说，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，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。朱总沉思一会说：你不要害怕。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，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，群众也是好

的。‘文化大革命’以来，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，但从整个军队来说，他们是拉不走的。干部中，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。但广大干部战士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。江青这人是打旗子，又有一部分人捧她。她的本事有多大，你不知道吗？去问问工人、农民、战士和知识分子，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？”

周恩来总理逝世后，朱总万分悲痛，经常两眼直直地望着天空，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，不时地念叨：“恩来，恩来在哪里？”康大姐说：

“我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掉泪。”

从周总理患病住院后，朱总就经常向身边的人询问周总理的身体状况，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。那一晚，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扶着手杖的朱老总，举起颤抖的右手，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可是人们没有看到，在向遗体告别往返的路上，朱总一直在流泪。更没有看到，那些天，朱总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。但是，朱总不顾这些，仍然执著地投入国事活动。别人劝阻时，他说：“总理去世了，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，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。”他以90岁的高龄，带着病开会，看文件，找人谈话，会见外宾，处理日常事务。当“四人帮”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，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，在毛主席领导

下，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，这个班子不要变动。一天，他收到揭发“四人帮”的一封信，毫不迟疑地转呈毛泽东同志并郑重附笔：“收到人民来信一件，事关重大，请主席酌处。”他接到成仿吾同志寄来的新校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，对照着阅读了一遍……

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，朱总的肺炎复发了。但他毫不在意，照样工作，照样会见外宾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，想的还是人民，还是革命。

6月12日，朱总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·拉齐拉卡。

6月21日，朱总病重了。按照原来安排，他要会见外宾。人们劝他休息，改由其他中央首长代替会见。他没有同意，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·弗雷泽。由于这次会见时间的改变，朱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，加重了他的病情。

6月25日，医生会诊后，建议立即住院治疗。朱总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，说：“不要紧嘛，等到明天我见完了外宾，再去住院也不晚。”

6月26日，朱总病情突然恶化，不得不住医院治疗。

7月1日，朱总除肺炎之外，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，高烧一直不退。这天，朱总把秘书叫到床前，问道：“今天是党的生日，报纸该发表社论了

吧，念给我听听。”

7月初的一天，朱总对到医院看他的李先念同志说：“我看还是要抓生产，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？”

弥留之际，朱总对周围人员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革——命——到底！”

“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。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‘四人帮’被粉碎，因为他希望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。可是都没有能够如愿……”

说到这些的时候，康大姐的语调更加沉痛。这不难理解，失去亲密伴侣的创伤，是时间无法平复的。但大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，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对先行者最好的怀念，不能只是泪水，只是誓言，而是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，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！”

你说得对，大姐！朱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，永远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将长久激励我们朝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，奋勇前进！



征途上的爱情



在刘伯承同志逝世的日子，我又一次见到了他的夫人、尊敬的汪荣华大姐。

呵！哀痛使她苍老得这么多，这么快。记得上一次我来时，她脚步轻捷地倒水拿烟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面色红润，神情欢快地向我讲述着漫漫征途和征途上难以忘怀的往事。可现在，她的头发更加花白，脸色十分憔悴，一双眼睛有些红肿，眼角边的皱纹更密更深更明显，走起路来也有点儿蹒跚了……

但她又是坚强的。每当见到前来悼念刘帅和看望她的人，尤其是一些老大姐们，她就抚摸着对方的手，或者互相搀扶着，用缓慢而沉重的语调说：

“不要难过，不要哭！我不难过，我也不哭！”话是这么说，可她的双肩，承受着多么巨大的悲痛啊！就在她这么对别人说的时候，我看到她自己的眼圈却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浸透



真情的泪水，理智的话语怎么能压抑得住？

目睹这位红军女战士的举动，我看到的是同志爱，夫妻情。

的确，失去亲密伴侣的创痛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撕心裂肺的，何况她和刘帅又是一对征途上甘苦与共、相濡以沫的夫妻呢！

我曾不止一次听人讲过，也曾听汪大姐自己说过，她是投身革命行列后，和刘帅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艰苦岁月里相识相爱，结成革命伴侣的。

汪大姐出生于皖西北一个纯朴的农民家庭，父亲母亲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苦农民。她很小的时候，就遇到了革命洪流滚滚、广大人民觉醒的年代。她去听村里农协开会时大家的发言，她去看斗争地主豪绅的场面，从而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。特别是她的姑父冯先卓对她的影响更大。这位在高中读书时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，和妻子谈的共产主义，谈的共产党，谈的妇女只有闹革命才能摆脱封建礼教压迫的道理，给在一旁的汪荣华幼小的心灵里撒播了火红的种子。所以，她14岁时就投奔红军，宣传和发动群众，战斗在鄂豫皖，转战于通（江）南（江）巴（中），在团里做医务工作，在红4方面军妇女先锋队做宣传工作，在川陕省苏维埃邮政局任副局长。当1、4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合时，她认识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。

第一次见到刘帅的情景，汪大姐还记得清清楚